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汉英北京官话词汇

「英」傅多玛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

分卷主编 翟赞 郭利霞 陈颖

汉英北京官话词汇

〔英〕傅多玛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北京官话词汇 / (英) 傅多玛(Thomas C. Fulton) 编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8488-9

I. ①汉… II. ①傅… III. ①北京话—词汇—研究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919号

- | | |
|-------|--|
| 书 名 | 汉英北京官话词汇
HAN-YING BEIJING GUANHUA CIHUI |
| 著作责任者 | [英] 傅多玛(Thomas C. Fulton) 编著 |
| 责任编辑 | 宋立文 王禾雨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488-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
| 印 刷 者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7.25印张 283千字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66.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19世纪来华传教士记录的官话方言及其历时演变研究
(16AYY002,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总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的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她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

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センター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郭锐、刘云

2016年10月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大力支

持下,早期北京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罇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述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主编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述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布鲁斯和爱德华兹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上册为中文课本,下册为英文翻译和讲解,用音标标注课文的读音。墨绿色烫金封面,纸张和装订极为考究,上册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随书唱片内容也由他亲自朗读,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词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簪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昆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

化、亦我、梅菟、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

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 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

导 读

郭利霞 郑 洁

清末民初，中国和世界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动荡，中外交流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断加深。随着中国门户开放，一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中的传教士为了有效地宣传基督教思想，必须深入学习汉语乃至传教地的方言；外交官和海关洋员为了成功处理相关事务，也必须学习和研究汉语。在此过程中他们编纂了大量教材、词典，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正如刘云（2013）所说，有些作者对汉语的语法体系和语言现象有独到的见解，因此他们的著作不仅具有语料价值，对汉语语言学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笔者所知，这些作者至少包括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高第丕（T. P. Crawford, 1821—1902）、罗存德（W. Lobscheid, 1822—1893）、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 1833—1884）、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禧在明（Walter C. Hillier, 1849—1927）、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等。

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1867年第一版，1886年第二版）无疑是受关注最多的一部汉语教材，狄考文的《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1892年第一版）、鲍康宁的《英华合璧》（*Mandarin Primer*, 1887年第一版）也受到了较多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以传教士文献作为选题，如岳岚（2015）、张海英（2014）等。相比之下，爱尔兰传教士傅多玛（Thomas C. Fulton，

1855—1942) 的《汉英北京官话词汇》^①(*Chinese-English Mandarin Phrase Book: Peking Dialect*) (下文简称《词汇》) 还鲜有学者涉及, 只有赵晓阳 (2005, 2007) 和刘云 (2013) 在介绍西人编写的北京方言文献或教科书时罗列了这本书。据笔者初步考察, 《词汇》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北方官话乃至北京话的语言特点, 是研究北京话历史面貌和发展变化的宝贵语料。

一、傅多玛和他的《汉英北京官话词汇》

(一) 傅多玛其人

傅多玛生于英国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 (County Antrim)。曾任英国驻盛京 (今辽宁沈阳) 领事。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M.A.), 1884年来华。

邱广军 (2009) 提到, 清朝末年首先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组织地开展宗教活动的基督教长老会是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词汇》的作者傅多玛就属于爱尔兰长老会。他于1884年奉命来到中国营口, 第二年, 他和同伴又在宽城子 (今长春) 创立教会。他们与同在锦州、营口创立教会的另两处爱尔兰长老会一起, 以这三个地区作为据点, 不断扩展基督教的宣传工作。

关于傅多玛在中国传教活动的记载主要围绕着“长春市基督教会”和“文会书院”。“长春市基督教会”始建于1886年 (清光绪十二年), 傅多玛是创始人, 也是本堂第一位外国传道人。

“文会书院”是傅多玛1894年于大西关月窗胡同高台庙成立的, 它的前身可能是英国长老会于奉天省设立的高等文科学院, 这里是很多中学毕业生进修的地方, 原名“文会馆”。馆主是爱尔兰人, 人称“纪大夫”,

① 我们采用赵晓阳 (2005) 的中文译名。

后“文会馆”改名为“文会书院”。傅多玛采用学道班课程教授初级神学，当时书院旨在培养未来东北地区各地的传道人，要求学生年龄低于50岁且头脑聪慧。总体的教学计划是八年学制，课程内容涵盖圣经（Scripture Knowledge）、教会史（Church History）、神学（Theology）、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基础科学（the Elements of Science）等，同时也接纳女性学生（女学主要由傅多玛的夫人米爱仁主持）。每年分别在春、秋两季开设两期，每期历时两个月。还设立了考查奖惩制度，书面考试（称为“小考”）在学习了圣经基础知识之后进行并以提高薪金作为通过考试的奖励。

随着教学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苏格兰人罗约翰（John Ross, 1842—1915）于1898年设立了神学院。傅多玛与罗约翰分开带班，将课程延长至四个学期，每个学期也由原来的两个月延长到六个月。学员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至少学习四年并且通过十六门考试，满足以上条件即可被推荐，通过本地教会的审批和注册，成为合格的传教士。医学科比较特殊，要分为两个部分培养，据记载有几个学生顺利完成了课程，获得了医学及外科学学历，成为了当时医院里的有力助手（MacGillivray 2010: 207—227）。

文会书院命运多舛，因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拳匪之乱迁到了广宁（今辽宁北镇），动乱平息后，又迁到了奉天府大南关。长老会特别派遣的老师 and 各地区的牧师担任主要的授课老师，同时也聘请省城的饱学之士担任中文教授，比如耿举人玉山先生、邵世臣先生、拔贡富业堂先生等。司督阁大夫（Dugald Christie）主要负责盛京施医院的主持工作，他医术高超，喜欢结交朋友，在官场也能左右逢源，曾在清朝光绪年间获皇帝赏赐的双龙敕书和勋章。他于1912年成立奉天医科大学，致力于培养西医人才（钱公来 1957: 225—226）。

（二）《汉英北京官话词汇》的体例和内容

笔者手头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影印本，191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该版本也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登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可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获取该资料。

从前言部分可以知道，《词汇》之前傅多玛就编写过一部记录汉语日常口语的手写本汉语书，面向那些初到中国（满洲里）的年轻传教士，由于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英国长老会又要求傅多玛编写了《词汇》。这部文献在之前手写本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内容，也扩大了受众范围，作者期望这部文献可以满足更多的群体学习日常汉语口语的需求（当然主要是北方官话）。

《词汇》写于奉天（Moukden，今沈阳），除去封面和扉页共四部分——前言（Preface）、主体正文（Chapter One to Twenty-four）、索引（Index）和勘误表（Errata），正文部分共215页，前言和后两部分单独编页。

前言介绍了编写该书的缘由及其适用范围和特点，提出使用本书的建议，并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 Rev. James Carson 致谢。

主体的正文部分共二十四章，每章之下有若干词组和句子，没有固定的主题。全书共有四千多个^①词语和句子。有的前后两句构成了问答句，不过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可以独立学习这些句子，不必与前后发生联系。另外，每个词语或者句子均有英文翻译，如第4页第二句“他要什么来了”，英文翻译是“What has he come for?”。

“常用部首表”（213—215页）是对汉字36个常用部首的说明，均有英文解释。如对“亻”的介绍：“亻 单立人 A single man standing erect, in contrast to the leaning form of the full character 人。”在介绍完一个部首后，作者

^① 作者在前言部分提及提供了三千多个词语和句子（Though I have here supplied over 3,000,...），据我们统计，正文部分的词语和句子总数超过了四千。

通常会由此引出一个汉字，比如在介绍完“亻”后紧接着原文写道“单立人加两横儿为仁字 The character 仁 is made up by adding two horizontal strokes to a single man.”

索引部分按照拉丁字母顺序排列英文单词，方便读者查找某一单词所对应的汉语说法出现的所有页码，帮助读者参考多个例句来理解该词。如索引中的“sale 123,191”即英文中的“sale”对应的中文说法可以在正文第123页和第191页找到。

勘误表主要用于提示正文中某一页某一行出现的错误和改正方法，分为三列，分别为页码、行号、改正方法。比如勘误表第xxiii页中某一项原文写作“40 12 After — insert 声”，意为在正文的第40页中的第12行，在“—”字后面插入“声”字。再如原文写作“74 10 Omit ‘Do’ and before ‘it’ insert ‘Take hold of (or carry)’”，意为在正文的第74页第10行，删去“Do”并且在“it”前面插入“Take hold of (or carry)”。以上两例可以分别代表作者对正文中文部分和英文翻译部分的修改。

二、《汉英北京官话词汇》涉及的话题

《词汇》的话题没有按照二十四章分类编排，最多只能说同一章的话题相对比较集中，有时同一话题会在不同章节出现。所涉及的话题围绕着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展开，我们归纳为以下十六类：

1. 初次见面寒暄

(1) 先生贵姓？

(2) 贵官篆哪俩字？

(3) 请问台甫怎么称？